贵州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场景压力与制度供给

■ 卓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衔接与程序协调,为内陆地区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提升跨境资源配置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将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与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纳入贵州战略定位,贵州省“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推动贵阳贵安在数据跨境应用方面先行先试。落实上述战略部署,需要在国家统一规则和法定权限框架下,完善适应贵州业务场景的实施程序,明确数据跨境流动的适用路径、授权依据和责任关系。通过增强规则的可预期性与程序的可操作性,降低企业合规与跨主体协作成本,推动算力供给、开放通道与产业场景转化为持续的跨境数字服务能力,是贵州以制度型开放拓展内陆开放空间的重要着力点。

从制度运行看,算力与通道的硬联通扩大服务可达范围,规则与组织的软联通降低交易不确定性。二者之间仍需完成从技术可行到业务可持续的转化。场景压力测试可以通过流程复盘和情景推演,考察条件变化后制度安排能否继续适用。因此,本文围绕“边界—权力—机制”展开分析,分别明晰规则适用条件、监管与授权权限、跨主体协作程序,有助于将地方实践转化为可检验的制度供给。这一过程通过降低规则解释、重复核验和跨主体协调成本,提高既有设施的服务转化效率,其效果需要由具体业务检验。

硬联通拓展内陆数字开放空间

贵州的算力集聚为跨区域服务提供了供给基础。2026年8月公开报道显示,全省建成和在建重点数据中心共50个,算力规模突破176EFLOPS;同年获批建设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由三家基础电信企业与贵州电网共同参与建设,为算力调度和算电协同提供组织支撑。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布局,贵州可将算力供给与东部地区的研发、客户和行业需求相衔接,进一步拓展模型适配、数据加工及专业运维等服务。但算力规模仍需经过软硬件适配、稳定调用与计量结算,才能形成可持续交付的服务产品。

开放通道则拓展了数字服务的需求空间。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老、中欧(中亚)等运输组织,使贵州能够经北部湾等港口连接东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经贸网络。据贵阳海关数据,2026年1—8月贵州对东盟货物进出口163.7亿元,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32.3%。现实经贸联系可带动供应链协同、物流信息处理和数字营销需求,为内陆地区发展伴随货物贸易的数字服务提供场景。通道建设还需与多式联运、专业服务及业务规则衔接,才能将过境流量转化为本地企业参与服务分工的机会。

酱香白酒、文旅、能源和山地农业,也为形成行业数据集与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差异化需求。贵州“模数工场”展示的AI酿酒等应用,体现了算力、模型与本地工艺知识结合的探索。工艺优化、质量追溯和游客服务中的数据,具有具体的行业知识与使用情境,其价值实现依赖质量标准、使用依据和收益安排。从产业记录到可交易的数据产品,需要将分散的生产主体、技术能力与市场需求组织起来,使数据能够持续更新、授权能够随用途变化而调整。

贵州的开放路径由此呈现出以内陆算力和产业场景对接外部市场的特点。相较于直接依托港口、口岸组织业务的沿海沿边地区,这一路径更依赖跨区域协作;自贸试验区的特定制度授权模式则须根据具体情境进行转化验证。基础设施和货物贸易联系提供业务条件,跨境服务能力还取决于规则适用、权责配置和专业服务能否衔接。

软联通积累数据流通治理经验

贵州已形成地方立法与专项政策相衔接的制度基础。《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规范交易场所、授权使用与权益保护,《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明确分类分级、部门职责和场景开放要求。《关于推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部署依法开展数据跨境流通交易、加强与港澳和东盟的智算合作。这些安排将产业支持延伸至流通规则和职责配置,为企业利用既有设施开展业务提供实施依据。

业务探索则形成了可观察的组织经验。贵州已建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贵综跨境数科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完成该所首笔“保税+大数据”跨境交易,涉及交易备案、境外数商数据要素登记、律师合规审查及入境后的开发利用支持。同时通过共建数据跨境服务创新中心,进一步探索贵州服务能力与东部企业境外业务需求的衔接。其制度价值在于将不同环节交由相应主体承接,使境外采购与境内利用具备材料记录和专业服务支撑。

场景授权也积累了治理方法。“政府监管授权+数据主体授权”的双授权模式,已经围绕特定用途组织数据使用关系。这一国内经验可为跨境业务中的授权衔接提供参考,其延伸适用仍需核验境外接收主体、处理目的及转委托关系。登记记录可以支持信息核验,使用授权和法定出境程序则各有适用条件。有学者研究指出,地方经验转化为制度供给,需要从具体业务中提炼可重复的操作方法,并在新的情境中验证其适用性。

现有积累表明,贵州具备开展场景检验的制度与组织基础。可推广的经验应保留原有业务的适用条件,明确依赖特定主体和资源的环节,和提炼能够形成通用规则的程序。只有将经验的有效性与可迁移性分别检验,才能避免个案经验在普适性应用中错配。应着重考察业务变化时路径判定、材料连续衔接、责任明确承接等环节的确认,使个案经验逐步形成稳定的服务程序。

以压力测试促进地方制度供给

场景压力测试应立足已经核验的业务,由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依托现有服务载体组织企业与专业机构开展流程复盘和情景推演。可在同一场景中对照原有条件与变更条件,记录触发事项、判断依据和处理结果,识别规则解释、证明材料或责任承接的具体缺口,并将其转化为指引与流程的修订依据。

明晰适用边界,完善分类指引。围绕入境数据加工回传、算力服务、跨境电商及特色产业数字服务,梳理数据来源、字段类型、处理地点、访问主体和使用目的,建立业务条件与适用规则的对应关系。对新增境内个人信息、重要数据或改变输出内容等情形开展推演,核验原路径和程序豁免条件是否仍然成立。《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已明确相关适用条件,地方供给可着重形成条件说明、证明材料和疑难转介指引。综保区围网与专用通道的记录可辅助核验处理行为,具体程序仍应依据法定条件判定。

规范权力运行,明确授权与责任。梳理网信、数据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区分政策辅导、专业服务与行政办理,明确跨部门事项的受理和转介关系。公共监管权限与数据主体授权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应在程序设计中分别说明依据,并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借鉴既有交易协作与场景授权经验,分别核验公共数据授权、企业委托关系及个人信息处理依据,关联记录使用范围、处理主体和期限。通过设置使用方变更、用途扩展和转委托等情形,检验由谁补充材料、核验依据与承接责任。服务中心承担咨询与转介,专业机构履行相应服务责任,企业落实数据处理者义务,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减少职责模糊引致的重复核验和责任悬空。

完善协同机制,促进经验持续修正。结合黔浙等合作,围绕共同业务衔接材料格式、服务工单与异常处置程序,并以实操中的具体情形,检验协作的连续性。材料复用应核对使用权限、处理依据与内容变化。可依托服务中心按期复盘高频场景,在重大业务变更时补充检验,将问题分类反馈至有权部门和服务主体,分别推动公共指引、合同条款及操作规范修订。评价应关注路径确认、重复补件和异常处置等结果,并区分企业准备、专业服务与行政办理时间,结合业务复杂程度分析实际成本。

以场景压力测试完善治理,旨在将统一规则落实为企业可识别、可执行、可验证的程序。贵州可通过边界核验、权责衔接与协同反馈,增强资源优势转化为跨境服务能力的制度支撑。推演判断还需由持续业务记录验证,经过检验与修订形成的地方经验,才能为同类内陆地区提供适用条件明确的制度参考。

(作者单位:贵州商学院。基金项目:本文系2026年贵州商学院校级项目“贵州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压力测试’与制度供给研究”资助)

数字乡村『微治理』的法治保障机制与效能提升路径

■ 张亚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强调“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村居网格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乡村矛盾调处、群众权益保障的前沿阵地。村组、网格层面“微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微治理”,推动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乡村善治根基的重要保障。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微治理”,是破解乡村治理现实难题的关键。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治理资源不断向村组网格下沉,乡村基层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在治理体系上,各部门自建政务App、业务小程序交叉并存;公安、民政、农业农村、应急等垂直部门系统接口不兼容、数据标准不统一,人口、宅基地、特殊群体等核心治理数据分散在各业务条线,造成系统孤岛、平台重复建设、数据壁垒等堵点,直接阻碍村务协同处置、风险综合研判与治理资源统筹调度,制约数字治理效能充分释放。在治理模式上,数字化平台按照城市政务逻辑设计,操作复杂;农村留守老人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线上治理排斥部分村民,出现“线上热闹、线下失语”,线上议事难以替代乡村熟人社会协商调解传统。在治理机制上,相关法律规定多为原则性表述,缺少数智场景下权责划分、数据保护、权利救济的细化规则,部分制度要求缺少数字化载体落地,多元主体权责不清,出现问题容易推诿扯皮,制度效能未能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为破解乡村治理现实瓶颈提供技术可能,但技术红利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善果。面对上述问题,不宜否定数字化改革方向,应当坚持问题导向,依托法治校准数字乡村“微治理”发展航向,把技术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善治效能。

以法治理念纠正技术工具主义偏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技术工具主义、重效率轻权利是制约数字乡村“微治理”行稳致远的思想根源,要以法治理念从价值引领、源头管控、程序管控三个维度综合纠治,推动技术逻辑服从治理逻辑、效率追求服从权利保障。一是筑牢法治价值引领,摆正技术工具定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村民主体地位,在数字乡村项目立项、系统建设阶段落实合法性审查,把群众实际获得感、基层减负成效作为评判标尺。明确数字化平台只是治理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村民自治,不能取代入户走访、面对面调解等群众工作,从思想层面破除“技术万能”的认知误区。二是强化项目与考核的源头约束。把法治审查嵌入数字乡村项目准入环节,从严管控部门随意新建App、小程序,遏制平台重复建设。发挥考核“指挥棒”的纠偏作用,从源头上破除“唯线上指标”的政绩导向,不将打卡数量、平台结案率作为主要考核依据,将基层负担是否减轻、群众诉求是否真正化解纳入绩效评价,倒逼基层摒弃重留痕轻实效的治理惯性。三是恪守程序正当原则,守住群众权利底线。重庆云阳渠马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借助线上办事平台的同时也保留村级线下服务窗口,针对老年群体推行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深汕特别合作区构建“线上村务小程序+线下擂茶议事”双轨协商机制,线上渠道作为补充,重大村务保留现场座谈,不强制村民使用数字化平台,确保不熟悉智能设备的村民依然能够参与村务协商、表达诉求,保障基层治理程序的普惠性与正当性。

以制度规范完善治理体系,夯实数字乡村“微治理”制度根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社会治理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等多元规范作用,为完善基层数字治理制度体系提供指引。浙江武义“后陈经验”为村级数字化治理提供重要制度参照,其通过村民自治章程固化基层公权力运行流程,将村务议事、监督、公开机制延伸至数字平台,明确线上村务审议、数据公示的自治程序,实现公权力数字化运行有章可循。江山市清湖镇的改革实践则印证了县域层面制度建设的现实价值,当地在系统整合的同时配套事件流转、责任交办、办结溯源的工作制度,以制度划定乡镇、村社、平台运维主体的权责边界,破解过去多平台并存带来的责任推诿问题。可见,数字乡村治理既要依托现有法律法规框架,鼓励地方出台配套实施细则,明晰网格、村民小组“微治理”主体权责,建立村级数据分级分类管理规则;也要用好村规民约、村级自治章程软法载体,把线上议事流程、村民信息保护要求纳入自治规范,推动国家法治规范与村民自治规则良性互动,让数字化治理运行始终置于制度约束之下。推动调解、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功能嵌入村级数字平台,让法治资源直达村组末梢。

以监督救济机制强化落地执行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数字乡村“微治理”要落地见效,离不开全过程监督约束、完备权利救济渠道与长效综合保障。在监督对象上,既要紧盯乡镇、村“两委”、网格员数字化履职,纠治过度留痕、算法滥用、违规采集村民信息等问题,也要将第三方技术服务商的平台运营、数据处理纳入监管,防范技术环节衍生治理风险。在监督主体上,构建多元协同监督格局。义乌依托“村务清廉钉办”数字平台,构建了集掌上办事、掌上监督、掌上公开、掌上治理于一体的“乡村智治”体系,形成了源头式、嵌入式、全覆盖的协同监督样板。在监督方式上,充分释放数字平台监督效能。浙江省数字化督查平台“浙里督”依托数据监测、重点督查、绩效考评等功能,搭建多级联动督查协同体系,实现基层权力运行、公共资源交易、群众诉求投诉实时监测,为数字场景下村级权力阳光运行提供实践样本,助力清廉乡村建设。与此同时健全分层权利救济路径。湖南新晃村-镇-县分级调处、浙江诸暨村级信访代办与共享法庭的实践启示,维权端口要下沉村组:村民对数字化治理处置存有异议,先经村级自治调解,再流转乡镇开展行政调处,重大争议由司法途径兜底,降低村民维权举证门槛,形成诉求受理、矛盾纠偏的完整闭环。

数字是手段,善治才是目标。数字乡村“微治理”建设,要坚持党建引领,用好法治手段校准数字化发展航向,平衡技术效率与群众权益。通过价值纠偏、制度完善、监督兜底,化解系统孤岛、数字形式主义等现实问题,防止技术异化消解治理实效。推动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深度融合,把技术优势切实转化为乡村善治效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于贵州高校青年绿色消费与悦己消费双重导向困境及引导对策的建议

■ 蒋奕珂 李玥锾 黄婉瑜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高校青年是消费市场里最活跃的群体之一。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演艺经济、票根经济、谷子经济、悦己经济。据省统计公报,全省普通高等学校80所,在校生91.50万人,在学研究生4.70万人。这一群体是最容易接受绿色理念的人,也是悦己消费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消费取向直接关系“双碳”目标能否落到日常,也关系全省消费市场的质量。

一、发展现状

(一)绿色消费认同高、落地少,知和行之间差距明显

课题组问卷显示,贵州高校青年对绿色消费的认可度不低,多数人认为这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也明确做法,但知道和做到并不统一。中青校媒的调查中,95.58%的大学生关注环境问题,落到具体行为上就打折扣;另有调查显示,选购商品时优先考虑可降解包装的只有36.2%,定期参加旧物置换的只有27.5%。访谈中不少学生说得很直白,绿色产品贵,学校周边也买不到,想环保但不太方便。可见绿色消费卡在两头,一头是价格,一头是供给。贵州绿色产品进校园的渠道少,绿色溢价又比东部高,落差自然被放大。

(二)悦己消费需求旺、引导弱,情绪化超前化苗头显现

随着谷子经济、悦己经济在贵州铺开,青年为情绪和兴趣付费的意愿明显上升。MobTech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24年年轻人为情绪价值和兴趣买单的比例达40.1%。课题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盲盒手办、偶像应援、网红打卡、游戏充值等消费增长很快。问题在于,需求起来得快,配套的引导还未跟上。部分学生习惯“先消费、后还款”,分期和信用支付用得比较随意;有调查显示,57.98%的大学生认为超前消费不是好习惯,实际照做的却不少。还有些学生把悦己变成情绪补偿,心情不好就下单,买完又后悔。

(三)两种导向同时起作用,群体分化加大引导难度

绿色讲节约,悦己讲释放,两种要求同时压在青年身上,处理得好可以互相成全,处理不好就容易摇摆。调研中看到两类情况:一部分学生把绿色消费当成个性表达,觉得用二手、骑单车挺酷;另一部分则是“为颜值买单、为环保口号点赞”,说的和做分了家。群体差别也很明显。城镇生源的悦己支出普遍高于农村生源,农村生源讲绿色多是出于节俭习惯;研究生对绿色消费的了解好于本科生;民族地区学生在节庆、人情上的花销结构与城镇学生不同,传统节俭观念和网络消费文化同时起作用。面对这样的分化,一套通用说法很难讲到每个人心里。

二、主要问题

从调研看,我省高校青年消费引导还有几个明显短板,政策、教育、价值引领三个环节存在缺失。

(一)政策各说各话,协同上还有缺口

《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和贵州省生态文明政策对绿色消费有系统部署,省政府工作报告又把悦己经济作为提振消费的抓手,但两套政策在高校这个场景里未能适恰。绿色消费的激励多停在倡导层面,绿色积分、碳普惠进校园的落地办法不多,学生觉得有热情、没实惠;悦己经济这边侧重培育业态和场景,对情绪消费的规范、风险提示偏少。结果是一边鼓励消费、一边倡导节约,学生听到的信号不一致,行为也就容易摇摆。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面向高校的实施细则还在健全中。

(二)育人体系不完整,教育链条存在断点

高校消费观教育总体跟不上消费形态的变化。课程上,相关内容多散落在思政课和主题班会里,没有专门课程,绿色消费、理性消费、金融常识没有落到通识教育中。方式上,还是讲道理多、体验少,学生遇到盲盒、直播带货、网贷这些具体问题,课堂上找不到答案。力量上,学校、家庭、社会各管一段,边界不清,家校之间缺少常态沟通。队伍上,部分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对谷子经济、直播电商了解不深,讲的内容和学生实际生活隔着一层。

(三)价值引导声音偏弱,正面叙事供给不足

社交平台和电商已经深度嵌入青年的消费决策,算法推荐、直播带货、种草营销不断强化即时满足,个别网贷平台还用低门槛诱导超前消费。青年消费又有很强的从众性,有调查显示,76%的大学生表示同学朋友买什么自己也会跟着买。面对“精致穷”“伪精致”这类说法,主流声音的量和准头都不够,绿色、理性的正面内容供给不足,学生缺少辨别力。家庭方面,84%的大学生表示家人认为该买的绿色商品自己也会照做,但多数家庭没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消费观养成中的分量,家校之间也缺少固定的沟通渠道。

三、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政策、教育、分众引导三个方面入手,把绿色倡导和悦己规范进行融合。

(一)把政策接上,让引导有统一方向

建议由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团省委等建立统筹机制,把青年消费观引导纳入全省提振消费的总体安排。一是把激励送进校园,依托碳普惠平台试点绿色积分,将垃圾分类、二手交易、低碳出行、光盘行动折算成可兑换的权益,让学生觉得绿色消费既有意义、也有实惠。二是把规范嵌进场景,在谷子经济、演艺经济这些青年聚集的地方加上理性消费提示,规范面向学生的分期和信用产品营销,守住金融安全底线。三是把两类消费接起来,借非遗夜市、中医药文化夜市等场景,引导学生在文化体验中形成健康的消费口味,支持“村超”“村BA”衍生消费规范发展,让为热爱付费和为绿色买单同时成立。

(二)把教育做实,让消费观进课堂也进生活

建议省教育厅指导全省高校把课程、实践、文化三块搭起来。课程上,开发结合贵州生态文化和民族节俭传统的本地教学资源,讲清楚绿色消费的价值、悦己消费的边界、超前消费的风险。实践上,多用案例、情景模拟和实地体验,依托校园二手市集、低碳打卡、绿色宿舍评比这些载体,让绿色从课堂要求变成生活习惯。风险教育上,联合金融机构进校宣讲,提高学生识别消费陷阱和不良网贷的能力。协同上,通过家长课堂、社会实践把家庭拉进来,补上家校之间的空档。队伍上,把新兴消费形态纳入思政课教师研修和辅导员培训。

(三)把引导分细,让不同群体各有各的办法

针对群体分化的实际,引导方式要从“大水漫灌”转向分类施策。一是按类型区别对待,对纯粹绿色保守型以巩固为主,对适度悦己平衡型多树榜样,对重度悦己超前型及时干预矫正,对绿色悦己融合型重点引导转化。二是按群体分层施策,对农村生源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善资助和平价绿色供给,减轻绿色溢价负担;对城镇生源和高消费倾向学生,加强财商教育和消费自律;对本科生、研究生安排不同深度的教育内容。三是把阵地建强,发挥共青团、学生会和社团作用,培养一批朋辈骨干,用短视频、校园媒体这些学生常用的渠道传播理性消费、绿色生活的正面内容。四是把监测跟上,建立高校青年消费状况动态监测,通过问卷和大数据定期了解观念和行为变化,发布校园消费观察报告,为政策调整和教育干预提供依据。

让青年走出绿色与悦己的两难,关键是把政策导向、教育引导、价值塑造串起来,让绿色消费成为习惯,让悦己消费回到理性,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和消费提质扩容添一份青春力量。

【作者单位:贵阳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2026年贵州省共青团省委、省社科院、省教育厅、省社科联青年发展研究课题《“双碳”目标下贵州高校青年绿色与悦己消费观的结构特征及群体分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QNYB26096)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张会 版式/李昂 校对/李雅